

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

□王　杰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列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元素时，明确提出了“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实事求是、知行合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是“两个结合”实现高度自觉的理论创新成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锻造了鲜明的精神标识，具有非常重要的时代意义。

“实事求是、知行合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为共同塑造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础。“实事求是”一词最早出自东汉史学家班固撰写的《汉书·河间献王传》：“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实事求是”这里指把事情（收集整理古籍）做得扎实周翔，求证典籍之“真本”、研究文章之“真义”、探索传承之“真相”。唐代学者颜师古注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意思是在摸清事实的基础上探求其真相与真义，强调的是一种根据实证、求索真知的治学精神。

“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是由明朝大儒王阳明提出的，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王阳明一方面强调道德意识的自觉性，要求人在内在精神上下功夫；另一方面也重视道德的实践性，指出人要在事上磨炼，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质言之，这是一种修身的智慧。

“实事求是”“知行合一”作为词语与范畴虽然出现在东汉和明朝，但其蕴涵的基本思想早已存在并延续至今。比如“开物成务”“学而时习之”“内圣外王”“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等等，这种注重实际、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与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是中华文明传承发展脉络中一以贯之的主流思想特质，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主要精神源泉。

“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核心精神在注重实际与实践。就时间维度而言，这种精神有助于形成不惧形势变化、勇于创新变革的无畏品格，为中华文明成为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创新性文明提供了重要的哲学思想基础；就空间维度而言，这种精神有助于共同体产生向内凝聚的磅礴力量，为中华文明成为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文明提供了重要的哲学思想基础；就胸怀维度而言，这种精神有助于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为中华文明成为胸怀开放、兼收并蓄的包容性文明提供了重要的哲学思想基础；就性情维度而言，这种精神有助于涵养共生并进、保合太和的理念与习惯，为中华文明成为坚持合作、不搞对抗的和平性文明提供了重要的哲学思想基础；概而言之，正是这些使得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使得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连续性文明。

“实事求是、知行合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基本思想方法。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样注重实际与实践，镌刻在马克思墓碑上的那句名言就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前进，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科学方法，带领中国人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实事求是”这一中国传统命题相结合，用“实事求是”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关键词。1937年，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1941年，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时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以实事求是为思想武器，破除了当时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倾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解决了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接着，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开创、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

2012年5月16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直接用过‘实事求是’这个词汇，但他们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突出强调的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同志用中国成语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作的高度概括”；“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它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和灵魂，即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灵魂，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和灵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实事求是与知行合一，指出：“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坚持从实际出发，前提是深入实际、了解实际，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知’是基础、是前提，‘行’是重点、是关键，必须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做到知行合一”；“只有把道理真正弄懂了，行动才能自觉持久；只有行动上落实了，对道理的领悟才能更深入”；“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从知行合一的角度审视自己、要求自己、检查自己”。

这些观点对为何与如何坚持实事求是、知行合一作出了深刻阐述，进一步丰富拓展提升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涵与意义，为新时代更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更加完善的基本思想方法。

“实事求是、知行合一”是“两个结合”实现高度自觉的理论创新成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锻造了鲜明精神标识。“‘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知行合一”是“两个结合”实现高度自觉的理论创新成果。“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治学方法相结合的理论创新成果，“知行合一”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知行观相结合的理论创新成果。“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实践论基本原理，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实事求是”治学精神与“知行合一”修身践履智慧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将之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有效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凝练成新的思想高峰。

“实事求是、知行合一”将知行合一与实事求是有机结合，对党的思想路线作了重大创新与发展。党的思想路线的发展，是一个不断丰富拓展并不断学理化与实践化的过程。“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实事求是是核心精髓，解放思想是前提条件，与时俱进是内在要求，求真务实是直接体现，而知行合一是落实关键。坚持“实事求是”在实践环节必然落实为“知行合一”，坚持“知行合一”在认识环节也必然要求“实事求是”，两者相辅相成、有机结合，构成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完整链条。

“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明确提出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锻造了鲜明精神标识。“实事求是、知行合一”关键在于一个“实”字，习近平总书记经常强调与倡导“注重实际、实事求是”“大道至简，实干为要”“知行合一、躬行实践”“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实”字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修养、社会风尚与文化气韵的鲜明精神标识。

“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对思想路线的认识与发展达到了新高度，对坚守魂脉和根脉、推进“两创”“两个结合”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对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体性达到了新高度，是我们进一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基本思想方法，是我们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行动指南。“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无疑是具有时代意义的原理性理论成果，需要不断深化理论阐释与实践探索。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教授〕

中华文明智慧

中华文化中的『以黄为尊』传统

□刘金祥

色彩在人类社会实践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颜色观念本质上是一个从属文化观念，不同色彩代表和诠释着不同的文化形态和文化意蕴。在悠久绵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黄、青、白、赤、黑是五种正色，而黄色排在五色首位，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将黄色奉为至尊色彩的深厚传统，黄色不仅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而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维度。

（一）

黄色属于三原色之一，其与红色和蓝色平均分布在调色环上，位置距离相隔大约在120度左右，是可见光光谱中处于绿色和橙色之间的颜色。不浓也不淡、不艳亦不素，介于白与青和黑与赤四色之间，从而合乎逻辑地成为中央之色，所以，东汉史学家班固在《白虎通·号篇》中写道：“黄色，中和之色，自然之性，万世不易”，这种突兀显赫却不十分刺眼的“中和之色”，非常契合不急不躁、不温不火、性格温和、心态稳健的中华民族，自然也就成为中华民族的首选之色。作为一种柔和温暖之色，黄色是构成缤纷瑰丽世界的重要色彩元素，从古至今一直受到国人的认可、青睐与喜爱。在漫长历史的演变过程中，黄色已不再是单纯的自然色彩，其内涵和意蕴更多地投射到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意识、心理习惯、民俗民风等精神层面和人文界域，呈现出特殊的文化象征意义。

“黄”字最初被创造出来时，其意并不是颜色，而是指射箭的箭靶，相传人文始祖黄帝时代的箭靶是用河里的泥浆制作而成，而泥浆大抵都是黄色，久而久之黄色便成为形容泥浆和土地的颜色。另外，以色彩命名人文始祖，这意味着黄色是中华文化的肇始之基，是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重要向度。在中国古代的色彩体系中，黄色绝不是诞生伊始就是最高贵的颜色，先秦时各诸侯国官员的礼服大都是上玄下黄，说明彼时黑色的地位要高于黄色；从当时染色工艺来看，黄色染料的来源众多广博，在所有彩色布料中黄色几乎是成本最为低廉的颜色，因而汉代以前黄色服饰遍及民间草根，普通百姓的衣着穿戴多使用黄色。

（二）

由于黄色的原初色彩和先天属性，决定了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除了人们常说的黄土高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和母亲河、黄皮肤是华夏儿女与生俱来的肤色等外部表征外，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五行学说是使黄色成为中华文化有机成分的内在依据。汉高祖刘邦认为汉取代秦是土德运行的结果，而土为黄色且居于五行的中央位置，所以将黄色定为天子服饰的颜色，由此黄色进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繁复博大的体系之中。隋文帝杨坚登基称帝后，明确规定各种御用品一律使用黄色，正式将黄色提升为封建王朝的御用颜色，对此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有所叙及：“开皇元年，隋主服黄，定黄为上服之尊，建为永制。”李唐政权推翻隋朝之后，唐高祖李渊沿用隋制，仍以黄色作为皇室使用之颜色，宋代学者王楙在《野客丛书·禁用黄》一书中记载：“唐高祖武德初，用隋制，天子常服黄袍，遂禁士庶不得服。而服黄有禁自此始。”到了唐高宗李治时鉴于朝野并用黄色带来诸多弊端，于是下诏禁止各级官吏和百姓使用黄色，黄色自此被皇族所独享，成为封建帝王的专用色彩。清代具有“崇黄”的深厚传统，其统治者定都北京后将黄色再度确定为皇家专用颜色。清朝灭亡后，随着封建统治的分崩离析，黄色回归于大众日常生活。

（三）

从魏晋南北朝和唐代开始，黄色还不断被用于传统文化艺术的诸多方面，我国著名三大石窟之一的敦煌石窟，至今保存着一万多幅极具艺术价值、史学价值和宗教价值的珍贵壁画，这些壁画大多以黄色为背景和主色调，金碧辉煌，明丽华美，是我国古代文化艺术的珍品和瑰宝。另外，黄釉被大量运用于唐代官窑陶瓷烧制，这种以铁为呈色剂的低温釉色促成了一代名品“唐三彩”的问世，明代弘治年间，黄釉瓷器以釉面光鲜、色泽淡雅、色彩绚丽名满天下，特别是鸡油黄成为古代瓷器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一种颜色。加之颇具象征意义和意象价值的“黄花”象征人们坚贞、纯洁的品格，往往被文人士子引入诗词歌赋之中，这些黄色在不同领域从不同角度赋予了中华传统文化多维多样的品貌和深彻丰赡的意蕴。

关于国人尊崇和敬畏黄色这一殊异而独特的文化现象，古代文献典籍有着众多记载和诠释：《周易·坤卦》说：“黄裳，元吉。”在这里黄色被看作一种吉祥的颜色，循着这一理念和思维，我国古代无论皇家抑或官府还是民间，均将和顺美好的日子称之为黄道吉日，这种文化传统甚至延续到当下。古人对黄色的解读呈现多种面向，意指黄色是一种相悖的事物可以互相对冲的颜色，它不仅符合自然界的本性和原貌，而且历经岁月流逝而未发生改变。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考工记》的“画绘之事”篇记述：“地谓之黄”，西汉淮南王刘安组织编撰的《淮南子》在“天文训”中描摹：“黄色，土德之色”，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黄，地之色也”，这些不同历史时期文献的阐释与记述，表明人们由敬慕养育自己的土地进而崇尚土地的颜色。黄色在五行中为土，黄土孕育了农耕文明，农耕文明滋养着华夏儿女，对土地与自然的敬仰与恭奉，致使国人尊崇黄色，这种将土地颜色奉为圭臬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上不绝如缕，《山海经》《世说新语》《太平御览》等众多典籍，都不同程度地记载了“女娲以黄土造人”的上古神话与崇尚土地之色的心理基因。

黄色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色和本色，蕴含着端庄、典雅、高贵和富庶，象征着兴旺、昌达、辉煌和崇高等，“以黄为尊”的传统自古有之，东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符验”篇中写道：“黄为土色，位在中央。”我国古代以农业文明著称于世，受农耕文化的长期浸润和深刻影响，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以土地为生命母体，对土地拥有一种深深的依恋。以黄土地为代表的中华大地，不仅生长着延续华夏儿女生命的物质食粮，而且涵育着滋养人们精神世界的文化基因。

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

——抗倭英雄戚继光的诗

□荆晓燕

2018年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引用了两句诗：“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指出“一代又一代科学家怀着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凭借深厚的学术造诣、宽广的科学视角，为祖国和人民作出了彪炳史册的重大贡献。祖国大地上一座座科技创新的丰碑，凝结着广大院士的心血和汗水”。

这两句诗，出自明代抗倭英雄戚继光的诗作《望阙台》，全诗为：“十年驱驰海色寒，孤臣于此望宸銮。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作为一员武将，戚继光在军事上的才能尽人皆知，实际他在文学上也颇有建树，清朝文学家王士祯曾提及古代能诗的名将十一人，戚继光便是其中之一。在戎马倥偬之际，除了《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军事著作外，他还在《止止堂集》中留下很多诗文篇章，在当时就享有“伟负文武才如公者，一时鲜有其俪”的赞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赞戚继光的诗“格律颇壮”“近燕赵之音”。《望阙台》就鲜明地体现了戚继光诗词慷慨悲壮的特点，它不是文人笔下的风花雪月，而是力重千钧的将军之笔，是在血与火的战斗中沉淀出来的凝练厚重，它穿越时空，千古传诵，传递不朽的爱国心、报国情。

望阙台在今福建福清，是戚继光自己命名的一个高台。戚继光在《福建福清县海口城西瑞岩寺新洞记》中记道：“一山抱高处，可以望神京，名之曰望阙台。”“阙”，本义是指皇宫，这里代指朝廷。戚继光用《望阙台》这个诗名，鲜明表达了他无论身在何处，始终心向朝廷的耿耿忠心。回首过去的岁月，倭寇来犯，海疆不靖，十年驰骋，出没风波，海色深寒；耿耿孤臣，独立高台，北望神京，心系社稷，誓死报国；心头之血，犹如繁霜，洒向山峦，千峰万壑，秋叶流丹。诗中有四个字让人印象深刻，分别是“寒”“孤”“血”“丹”，前后对照，明显体现出冷色调向暖色调的转换。“寒”字不仅表达出海水的清寒，也表达出抗倭战争的艰苦卓绝；“孤”字与“寒”字相呼应，隐晦表达孤军奋战的悲壮以及得到朝廷信任与支持的渴望，惆怅之情、悲凉之意，溢于言表。但不管面临怎样的困局乃至危局，诗人心中始终涌动着保家卫国的一腔热血，洒向层层山峦，化作红叶片片，这如霞似火的生命之色，彰显的是报国之心的赤诚与热烈！

戚继光出身将门，文韬武略，胸怀大志，心忧天下。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戚继光袭祖辈封职，任登州卫指挥佥事，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次年，他看到沿海百姓深受倭寇劫掠之苦，立下宏愿：“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之后的漫长岁月，他都用行动践行这句誓言。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戚继光奉命调到浙江抗倭前线抵御倭寇，他战功赫赫，取得彪炳史册的台州大捷，迅速扭转了抗倭斗争的被动局面，之后又转战福建、广东，血战横屿、大破牛田、强攻林墩，解仙游之围，彻底剿灭了横行东南沿海的倭寇。而在这骄人战绩的背后，是他的奔劳驱驰，“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是他的呕心沥血，“一片丹心风浪里，心怀击楫敢忘忧！”他创建了戚家军，勇猛善战、威震敌胆、屡立战功；他创设了鸳鸯阵法，机动灵活，攻守兼备，所向披靡。在抗倭结束奉命北上后，他又翻修长城、北御鞑靼、保境安民。《明神宗实录》曾对戚继光的一生作了精当的总结：血战歼倭，勋垂闽浙；壮猷御虏，望著幽燕。

这世上有一种人，生前，犹如栋梁之材，挺立苍穹，栉风沐雨，凌霜傲雪，担当重任；死后，犹如胡杨一般，枯而不倒，倒而不朽，凛凛风骨，给人力量。“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这样的热血丹心，从未被遗忘，我们在今天依然能够感受到它的温度。在山东蓬莱阁景区里，戚继光纪念馆再现他戎马相伴、以身许国的一生，他的故事被讲述、被传颂；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上，戚继光号训练舰劈波斩浪、扬帆远航，他的精神被铭记、被传承。

古典文学中的家国情怀